

## 序一

# “新加坡模式”中的 “柔性力量” ——半世纪前郭振羽教授做了对的选择

■ 高希均<sup>\*</sup>

如果“性格”决定成败，那么“选择”更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新加坡人民选择了“对的”李光耀为领导人，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新加坡；新加坡大学选择了“对的”教授郭振羽来执教，郭教授也选择了对的学府来奉献。“正确”的选择产生了彼此持久的双赢。

这篇序文叙述这段半世纪一位学者与社会进步相得益彰的历程。本来拟对郭教授新著《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写篇心得，读完全书后，觉得应当把新加坡引进国际人才产生的无形价值，做为论述“新加坡模式”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要素。

### （一）新加坡迎来了社会学家郭振羽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因为及时吸引到一批又一批的海外人才——此处特别是指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受过严格的西方教育的大学教授——有些是短期访问，有些是长期留下奉献（如郭教授），变成了新加坡学术界最不可或缺的一群新生力军。他们变成了东西

---

<sup>\*</sup>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台北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创办人。

方学术文化的桥梁角色，树立了学术进步、独立思考的示范功效，更进而扩散了“隐性力量”（Soft Power）的持续贡献。而此处“隐性力量”是指相当于大家熟悉的“软实力”。

1973年新加坡大学聘请到了一位在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年轻教授。这是双方双赢的开始。

我自己在威州另一校区经济学系已任教几年。在开车不到二小时的范围内，附近执教的好几位年轻的东方教授（也包括后来到新大执教的萧启庆教授），每隔一段时间常有聚会；我们终想把自己所学，能对台湾与大陆及其他华人地区有所贡献。

友朋中第一批在1970年代初，决心回到东方的，就是郭振羽夫妇去新加坡执教。从他出版的这本著述中，我才更清楚他对新加坡社会近半世纪来的各种具体贡献。

## （二）宛如创设了五个新企业

郭教授在1970年代加入新加坡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梯队，积极开拓萌芽中的社会学。经过近20年的教学与研究所建立的声誉，振羽在1990年受邀投入学术行政，负起了先后五个创系、创院、创刊及创学术中心的开拓工程。每个创设都有杰出表现，列举如下：

- 创系：
  - ~ 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众传播系，创系主任，1990-1995；
- 创院：
  - ~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1992-2003；
  - ~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署理）院长，2003-2005；
- 创刊：
  - ~ 《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创刊主编，1990-2010；
- 创中心：
  - ~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首任主任，2012-2016。

因此，37年奉献于新加坡社会后，2010年郭教授退休时获颁南大“终身荣誉教授”荣衔，当然是实至名归。

郭教授的贡献不仅是学术理论的引介，更是大学系所中心的建立；不仅是言教，更是身教。综合地说：郭教授展现了社会学家的观察力、传播学者的说服力，又掌握了社会脉动中的独立思考力与融合凝聚力；这是一种罕见的IQ与EQ的结合。受益于门下的学子以及看过他论文及听过他演讲的，何止万千。这股无形的社会收益，是不能低估的。

如果郭教授负责创办的这五个学术系所，变成了五个“新创企业”，那么在这位执行长（CEO）的有效营运下，个个都会是“盈利”的事业，且个个都可股票上市。这样的“量化”会是一笔惊人的资产。

哈佛奈伊教授（Joseph Nye）倡导的“柔性力量”（Soft Power），在新加坡做了最恰切的示范。因此，“新加坡模式”是反映出了政治领袖治理的“硬实力”与引进人才所产生的“软实力”，两者相加相乘的综效。

当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人，能指出国外人才早期就投入新加坡现代化的重要性，那就更丰富了“新加坡模式”传播的吸引力——那就是除了强而有力的上层领导，必须也要有很多“隐性力量”来支撑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建国总理李光耀独占鳌头，而参与各层面建设奠基的学者与专家也功不可没。

2015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前，我在新加坡现场多次听到他的谈话与演讲，这使我们相信：“元老政治家对国家最后的贡献，是在夕阳西斜的余晖中，仍能为下一代提供旭日东升的远景。”

新加坡与台湾相距甚近，因此四十余年我与振羽常有往来，尤其1986年与政大新闻系校友王力行、张作锦创办《远见》杂志后，他在百忙中，常接受撰稿邀约；我在11年前在台湾受邀主办跨国界的“星云真善美传播奖”时，请他担任海外评审。七年来，三位杰出新加坡传媒人林任君、郭振羽、李慧玲，都获得了传播奖的最高荣誉（奖金稍高于美国的普立兹新闻奖）。

### （三）“新加坡模式”的观察

近10年来，去美国，就感觉到美国领导及国力的衰落；去大陆，就感觉到普遍有“中国人站起来”的骄傲；去新加坡，就感觉到这个现代化之岛放射出来强烈的自信与些许自谦。

只要出访回台，就对1980年代“四小龙”之首的台湾，未能抓住时机，陷入了“中等所得国家陷阱”，感到惋惜。

进入21世纪，台湾要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有价值的一员”，是何等遥远。本身就必须要具备有三个共识：

- (1) 对外坚持“开放”，来增加竞争力；“封闭”、“歧视”与“保护”不应当是一个理性的选项。
- (2) 与世界接轨，才能扩大贸易、投资、市场与经济规模，分享全球化的利益。
- (3) 与庞大及快速成长的大陆市场发生密切的经贸互动，是好策略，不是灾难。

李光耀常常提醒台湾友人：“很多国家羡慕台湾的地理位置与大陆共有的语言、文字及文化。”

如果当台湾决心摆脱锁国心态，要“根留台湾、连接亚太、布局全球”，那么新加坡官方谦称的“实验”就提供了一个范例。

这个面积仅有721平方公里的“淡马锡”（古称），有多元族群，有四种官方语言，但缺少资源（包括缺少人才与水源）。但是新加坡被评为是“全球化指数”最高的国家，“生活素质指数”、“全球金融中心”也名列前茅。多年来国际竞争力排名均在全球前三名，总理年薪高达160万美元，为全球最高，教授待遇约为台湾四至五倍。在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其中之不少科系，都出现在顶尖的排序中。称这些成就为“新加坡奇迹”，应当比“新加坡模式”更名符其实。

#### （四）“可被利用的地方”

读完了《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使我多年来一直孕育脑海中的一个假设终于成形。那就是“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必须再增补一项：它以高薪及工作挑战性，它以现代化机制及优良的生活环境，延揽到了全球人才，使新加坡变成一个“可被利用的地方”。

去年6月在新加坡与吴作栋前总理聚晤。晤谈中他对新加坡经常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的解释，十分有说服力，发人深省。他说：“我们新加坡时时刻刻都在想：我们能为世界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来新加坡？来这里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可以吸引他们？”归纳起来，新加坡有什么“可被利用的地方”？

接着他举出一连串辉煌的实例，证明了新加坡政府的决心，及大学、医院与相关公共设施，再加上英语及绿化的生活环境——因此它常被称为东方社会中最西方化的大都市。

在法治、安全、效率等的国际认证下，新加坡的机场、港口、金融机构等等，都变成了处处可“被利用”、“被使用”、“被运用”、“被借用”的地方。“利用”与“被利用”偶然会被解释成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了亏。这里当然是指双方的“双赢”。

#### （五）双方的幸运

这位跨越东西文化，兼容并包的社会学家、传播学者及高等学府中卓越的行政首长，终于出版了《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本书共有五辑。读完一些以前看过的及从未看过的文章，不得不佩服振羽的远见。尽管中文著作上或许还不及他夫人罗伊菲的产量，但质量当可媲美。

这些文章中，从1973年初抵新加坡的印象到此刻的老而弥坚，每一辑的文章，每一个任务的挑战，让我为这位当年离开美国教职，而来到新加坡的老友感到庆幸。新加坡提供了专业发展所

## 序一

「新加坡模式」中的「柔性力量」——半世纪前郭振羽教授做了对的选择

需的机会、土壤、经费，及英语与华语的大环境。从短期任教的学者，变成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分子——“他乡”不再是“异乡”。振羽夫妇从西方飞来，迅速地在东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真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社会与人才流动，所创造出双方的幸运与双赢。